

溯源/甘肃

# 秦的文字和文献编纂

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

秦国及秦朝的文字,上承殷周古文字之遗韵,下启汉以后中国通用文字之先河,是秦灭六国,统一天下后通行文字的正宗。秦的文献编纂以《史记》《吕氏春秋》为代表,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文史编纂的模式。成就斐然,影响深远,是发源于甘肃的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## 1 秦的文字之演变

秦国最早使用的文字是籀(zhòu)文即大篆。它是从殷周甲骨、金文发展而来。著名的《石鼓文》和甘肃礼县秦墓出土的秦公钟、秦公钺,天水出土的秦公簠铭文等,都是大篆文字。它与东方列国所用的“古文”不同。秦统一六国,实行书同文即统一文字的过程中,由丞相李斯等以秦大篆为基础,或直接取用,或略减笔画,改大篆为小篆,作为秦朝通行的官方文字。七国时期,“田畴异亩,车途异轨,律令异法,衣冠异制,言语异声,文字异形”“秦始皇初兼天下,

丞相李斯乃秦同之。罢其不与秦文合者,斯作《仓颉篇》,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,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,皆取史籀大篆,或颇省改,所谓小篆者也。”(清·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)唐人颜师古注班固《汉书·王莽传》说:《史籀篇》是周宣王太史名籀者所作。

汉·许慎说:“秦书有八体:一曰大篆,二曰小篆,三曰刻符,四曰虫书,五曰摹印,六曰署书,七曰殳(shū)书,八曰隶书。”(清·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)王国维先生认为战国秦文,“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

同,其什一与籀文同。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。”“篆文固多出于籀文,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,谓之用篆文可也,谓之用籀文亦可。则史籀篇文字,秦之文字,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。”(王国维《观堂集林·史籀篇证序》)王国维的说法是有依据的;但许慎的叙述除分类标准不一外,它的历史性贡献,不光是让我们看到秦文字书写形态的多样性,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秦朝统一文字的来历、发展过程及其在中国文字改革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

## 2 秦的史官制度及文献编纂

### 秦的史官制度

史载秦文公十三年(公元前753年),秦国“初有史以纪事,民多化者。”(司马迁《史记·秦本纪》)这是秦设史官最早、最明确的记载。在这之前,秦先公的历史事迹和在位时间,主要是以口头流传的形式相互传播。

史载秦文公(公元前765年—公元前716年)曾“梦黄蛇(蛇)自天下属地,其口止于郿衍。文公问史敦(史官名敦),敦曰:‘此上帝之征,君其祠之。’”于是秦文公建造酈时,用牛、羊、猪三牲祠祭上帝。上述前一条史料说明秦国始设史官的年代,这条史料又讲秦史官名敦的人建议秦文公祠祭上帝,两条史料表明秦国设史官的时代和事实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又载秦穆公即位后,大病一场,五日不醒。醒来后,说他梦见上帝,上帝命他帮助平息晋国的内乱。史官将这件事记载下来,藏入册府,证明秦史官记事制度的行迹。《吕氏春秋·去宥》篇提到“史定”其人,高诱注释说:“史定,秦史。”意为史定是秦国的史官。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记载:赵惠文王二十年(公元前279年),赵惠文王与秦昭襄王在渑池(在今河南渑池县西)会晤,“秦王饮酒酣,曰:‘寡人窃闻赵王好音,请奏瑟。’赵王鼓瑟,秦御史前书曰:‘某年月日,秦王与赵王会饮,令赵王鼓瑟。’”这时,不甘示弱的蔺相如上前说: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,请奉盆缶秦王,以相娱乐”。秦王愕然,最后很不乐意地敲了一下缶。蔺相如“顾召赵御史书曰:‘某年月日,秦王为赵王击缶。’”这是秦与赵国同样有史官,随从国君参加政治活动的明证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记载:张苍在秦朝做过御史,管理

四方文书,故熟悉官府图书和上计(地方官向朝廷汇报治绩的活动)。又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:“博士,秦官,掌通古今,秩比六百石,员多至数十人”,这一有数十人之多的博士官,“掌通古今”,可见史官、史学在秦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。另有,秦相李斯建议焚书的秦文中说: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”(《史记·秦本纪》)也明白地反映出秦的史官制度。

### 秦的文献编纂

秦国见于记载的史学著作,最著名的是《秦记》,它是秦的国史。若从秦文公十三年(公元前753年)算起,《秦记》比孔子作《春秋》还早50年。《秦记》的内容为秦先公先王的世次和大事记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记载:秦统一六国后,焚天下诗书,诸侯国的史籍毁坏殆尽,那是因为各诸侯国的史书记载对秦有讥讽的言辞。史书之能复见于世者,多赖私人收藏比较多,有的躲过焚书厄运。列国史书文献多藏于宫室,又多是孤本,一把火就能将其彻底毁灭,只有《秦记》地位特殊,被保留下来。它虽记事不标日月年代,文字简略,挂一漏万,但对帝王世系、政治家权谋应变等的记述,颇有可取之处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就曾充分采用《秦记》的

资料。《史记》之《秦本纪》《秦始皇本纪》《六国年表》等都是在《秦记》的基础上,博采《春秋》等史籍写成。

《编年记》:1975年,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《编年记》,从五十三支简文译出。据介绍,它采用编年体的形式,记载秦国从昭襄王元年(公元前306年)到秦始皇三十年(公元前217年)间秦国、秦朝的史事。还记载墓主喜(人名)的生平事迹。它将国史与家史合并记载,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。



秦公簠



秦公簠铭文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## 3 秦的其他文献编纂

秦除史书以外,其他文献编纂成果,流传下来最有名的是《商君书》《吕氏春秋》及刻石、金文、简牍文书等。

《商君书》:它是战国后期秦国商鞅后学收集商鞅论著编辑而成。《四库全书·商子》提要说:商鞅姓公孙氏,为秦客卿。秦孝公三年(公元前359年),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,秦孝公接受他的建议。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,实行一系列政治变革,其核心是“农战”和“法制”。商鞅的“农战”思想是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,把民众集中到农耕和为国作战。这一做法抓住诸侯争霸、统一天下的关键措施,故能有力地冲击和摧毁旧的政治、经济秩序,使秦的财力、兵力迅速提升,成为七国之翘楚。

商鞅及《商君书》提出的重武轻文,重本抑末,重赏轻罚,重刑轻赏,讲求法制,从社会实际出发,抓住富国强兵、统一天下的关键措施,坚信“圣人知必然之理,必为之时势,故为必治之政,战必勇之民,行必听之令。是以兵出而无敌,令行而天下服从”。(《商君书·画策》)由于这些思想和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,故能一呼百应,行之有效,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和蓝图。

《吕氏春秋》:这是战国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一部政治论文集。吕不韦,卫国濮阳(今河南濮阳)人,他在韩国经商致富,“家累千金”。吕不韦在邯郸结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,助其继承秦国王位,是为秦庄襄王。吕不韦由此被任命为丞相,封文信侯。秦始皇称他为“仲父”,食邑十余万户。《吕氏春秋》就是他任丞相后组织编纂的。

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,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,奖励耕战,连衡诸侯,取得显著的成绩。秦孝公之后,经秦惠文王、秦武王、秦昭王几代人的努力,秦国经济振兴,兵力强盛,破纵连横,而使诸侯已困,秦有余力,终致“强国请伏,弱国入朝”,成为统一战争潮流中的核心力量。然而从另一方面讲,秦自商鞅变法后,侧重武功和政治设施,而不重视思想文化建设,诸子百家在东方各国风起云涌,而在秦国则闻(qù,意为空虚)然无闻。吕不韦面对这一短板,乃从东方各国招来3000多名文士养做门客,鼓励他们著书立说,各抒己见。于是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、纵横、兵、农、名家等学者纷至沓来,集聚秦国,悉心于学术研究。

吕不韦兼采诸家之长,编辑为十二纪,八览、六论,共二十余万字的《吕览》,后改名为《吕氏春秋》。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:

**法天地的思想**——认为:“天道圜,地道方。圣王法之,所以立上下”“主执圜,臣处方。方圜不易,其国乃昌”。提示统治者严格遵循天时、地宜和人纪的法度行事。

**人主为政的思想**——《吕氏春秋》的“十二纪”以时间为序,罗列一年十二个月顺天行事的基本内容,“十二纪”分为六十一个子目;“八览”分为六十三个子目;“六论”分为三十六个子目,全书共计一百六十篇。它广泛、深入、系统地讨论帝王的政治来由、品格、职责及为政之道。认为帝王是为天下而设的,故其品格和职责要公,要有利于天下。其为政之道提出许多原则性主张。最主要的,除法天地,随时变外,还要保持国家思想法令统一,行孝道、纳忠言,“正名审分”即循名责实、礼贤下士、善用民力。用民之道首先要爱民,顺民心,从民望,一切以民为出发点和归宿。

**因时变法的思想**——在传统制度与现实的关系上,明确地提出“时势异也”。要“因时变法”。不能照搬现成的法。提出立法时,对于先王的“成法”要“法其所以为法”,即学习先王针对现实立法的原则,切不可原封不动地照搬成法,食古不化。作者指出:“治国无法则乱,守法而弗变则悖,悖乱不可以持国。世易时移,变法宜矣。譬之若良医,病万变,药亦万变。病变而药不变,向之寿民,今为殒子矣。”

**用兵之道和止兵之术**——针对当时社会流行的“偃兵”即停止用兵说,《吕氏春秋》提出“义兵”说,以纠正前说的偏颇。认为争斗是不可避免的。自上古初民以来就有之,“五帝固相与争矣,递兴废,胜者用事”。天子、君主都是从斗争中产生。禁不住、止不了,“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”。要看用兵的性质如何,而不是止不止兵的问题。“兵不可偃也,就像水火。善用之则为福,不能用之则为祸。”义兵是治理天下的良药。君主若能兴义兵,“以诛暴君,而振(拯)苦民”,百姓一定会欢呼而投向“义兵”。作者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,拥护正义战争,反对不义之战,并提出以国家内部得到治理,来防止外敌的进攻,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**重农抑商的思想**——该书继承商鞅变法的思想成果,倡导重农抑商。如《贵当》篇说:“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,古今无有。”《上农》篇说: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,先务于农。民农非徒为地利也,贵其志也。民农则朴,朴则易用,易用则边境安,主位尊。民农则重(慎重),重则少私义,少私义则公法立,力专一。民农则其产复(增加),其产复则重徙,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。

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(合),不合则不可以守,不可以战。”这些观点,都与商鞅的思想如出一辙。

《吕氏春秋》在史学上是一部典范性著作。其兼收并蓄的史学方法,服务于当世的编史目标,独创一格的体裁形式,都为后世史家树立样板,引来不少模仿之作。历史上对于其书的评价不一。汉人高诱说:“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,以无为为纲纪,以忠义为品式,以公方为检格,与孟轲、孙卿、淮南、扬雄相表里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·吕氏春秋提要》也肯定地说:吕不韦固然是一个小人,但他编纂的这部书,却比其他诸子的论说更加纯正。它以儒家思想为宗旨,兼取道家 and 墨家学说。较多地引用儒家“六经”的文字和孔子、曾子的话,但不取其怪诞放纵、无所顾忌的内容;引用《墨子》也不取其批评儒家和有关鬼神的论述;对于纵横家的方术,刑名家的观点则一无涉及,可见其持论严谨,后世讨论这部书的人,因为鄙视吕不韦的人格,故对此书的评价也不高,这不是公允的态度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不仅弥补秦诸子之学的不足,也为秦国的统一及其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、历史经验和政治方案。其纪、览、论的编纂形式,在史书编写上也是一种创新。它是秦国学术著作的重大成果,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。

刻石、金文、简牍文献:前述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秦代著述,还有《羊子》《黄公》《奏事》等。其中“《奏事》二十篇”下注:“秦时大臣奏事,及刻石名山文也。”可见它包括秦始皇东巡刻石及其他石刻资料。

《不其簠铭》是秦庄公时(公元前821年—前778年)的遗物。像这样的鼎、簠等青铜器铭文,在甘肃出土了好几件。

简牍是战国至秦朝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,在湖北、四川、甘肃等地相继发现秦简五万余枚。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460枚秦简尤为引人注目。考古工作者从放马滩出土秦简中整理出《日书》甲乙两种和《墓主记》(又作《志怪故事》)。《日书》作为古人选择出行、做事的时日,避凶趋吉的工具书,内含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民俗的重要资料。《墓主记》包含秦国官制、基层行政机构设置等资料。更有学者将其看作是志怪小说的滥觞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目前人们整理出来的、记录秦国人在今天甘肃地区活动的简牍文献其实还有很多。